

【文摘】

馬一浮：生平·佛緣·佛心

陳星

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

一

馬一浮，乳名錫銘，幼名福田，號湛翁，晚號蠲叟，或蠲戲老人，浙江紹興人。一八八三年四月二日生於四川成都，此時正值其父馬廷培任四川仁壽縣知縣。馬廷培雖為官，卻是一個忠孝兩全之人。據載他為官時，其母仙逝，因未被獲准回紹興原籍奔喪，遂有退出官場之意。一八八八年，馬廷培攜妻帶子返回浙江，馬一浮時年五歲。馬一浮自幼聰穎過人。十歲時所做五言律詩即有驚人之句。十一歲那年，馬家請了一位頗有聲望的舉人鄭墨田來家裏教他讀書。可未過多久，鄭墨田即請辭。馬廷培以為兒子不聽教誨，或何處得罪鄭氏。但一瞭解，方知馬一浮才智過人，鄭墨田自愧不能勝任，為了不耽誤這「神童」的前程，才提出辭教。此後，馬一浮以自學為主，他的過人才智終於在他十五歲那年的縣試上得到了表現。這一年，馬一浮赴紹興城參加縣試，同場應試者還有魯迅、周作人兄弟。結果，馬一浮名列榜首。關於此，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有記：「……會稽十一僉，案首為馬福田，予在十僉第三十四，豫才（即魯迅——引者注）兄在三僉第三十七。」

自從馬一浮在縣試中得了第一，一時名聲大振。鄉賢湯壽潛（民國浙江省首任都督、交通總長）即調來馬一浮的文章閱讀，為之讚歎不已。湯氏慕才心切，即以長女許配。馬一浮十六歲時與湯家大小姐完婚。此正是他求知欲最為旺盛之時，所以，他一面鼓勵妻子認字，以為「不能識字，比於盲瞽；不能讀書，比於冥行」，一面又到上海同文會堂學習英文、法文。一九〇一年春，馬一浮的父親病逝，料理完父親的後事，他再度赴滬遊學。他與好友馬君武、謝無量一起在上海創辦了《二十世紀翻譯世界》雜誌。雜誌設有哲學、政治、社會學、教育史等十二個欄目，很有一點涵蓋二十世紀世界文化的氣勢。然而，就在他血氣方剛，欲展身手之時，忽接家電，其妻病危。馬一浮接到電報，當夜動身返鄉，當他趕到家中時，妻子已經去世。喪妻的打擊，使馬一浮哀痛不已。他寫了《哀亡妻湯孝愍辭》，多少也表達了自己未能照顧家庭的愧疚。並表示羊補牢：「自此遂無再婚之意。」果然，馬一浮此後孑然一身，直至終老。

一九〇三年，清政府駐美使館留學生監公署正需要一位中英文俱佳的人任秘書，經過嚴格地挑選，選中的居然就是馬一浮。該年六月，年方二十的馬一浮抱著試試看的態度來到了美國北部的聖路易斯。在美國，馬一浮做的是留學生監公署的工作，所以他對當時中國留學生的狀況頗為熟悉。他對中國留學生在政治態度上的麻木不仁頗為反感，便對清政府也產生了層次的認識。他在美國整整一年，雖未進學校進修，但他在這一年中，所讀的書委實不少。從他的記述中可知，他此時的讀書，幾乎包含了世界的歷史、哲學、文化和藝術等各個方面。一九〇四年五月，馬一浮到了日本，為時半年。他仍未進入何種學校，卻在日本人烏瀉隆山那裏學習了德文。同年十一月，馬一浮回到祖國。

按馬一浮的經歷，他原本應該是一位「西化」的人物才對。然而，儘管他到過歐美日許多國家（在美國供職時期，他還任萬國博覽會中國館秘書，曾遊歷英倫三島及德意志），讀過大量的西方著作，但他回國後並未像一些留學生那樣，一回國就不遺餘力地宣傳西方文化思想，而是靜居江蘇鎮江焦山海西庵一年，用這段時間來研究、消化西學理論和西方文藝。他像是有意要把中西文化作一番徹底的研究對照似的。一九〇五年底，他從鎮江轉到杭州，並在一九〇六年起開始把研究重點放在國學方面。為了安心讀書，他經當地的肇安法師介紹，住進了西湖邊上的廣化寺中的一間禪房裏。這廣化寺，距杭州有名的「文瀾閣」很近，他就每天到那裏去讀《四庫全書》。馬一浮在廣化寺一住就是三年，他有一首題為〈歲暮書懷在廣化寺〉的詩，記述了他當時的讀書境況：

故國驚心物候回，不堪衰痛日相催。  
江城鼓咽寒潮動，佛閣青燈夜雨哀。  
天童遙憐征戰苦，邊風時送雁聲來。  
崎嶇萬事憑誰問，且草玄書瀉玉醅。

馬一浮這麼一讀，似乎讀出了古書的滋味。他驚歎於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按照大學者馬敘倫的話說，此後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與古人為伍，不屑於世務。」他的「不屑於世務」，確有事實為證。民國成立後，蔡元培任教育部長時，想到了他的世誼同鄉馬一浮，特寫信邀其任教育部秘書長。看在朋友同鄉的面子上，馬一浮勉強答應，可到南京上任後不到三個星期，即辭職回到杭州。他對蔡元培說：「我不會做官，只會讀書，不如讓我回西湖。」

馬一浮去職後，曾赴新加坡一遊，親眼看到當地僑民在辦學中不廢經學，以儒學為國教的情況，與國內的情形對照，他感慨萬千。於是他歸國後，更埋頭於鑽研國學，並且開始涉及佛教。他廣交高僧大德，通讀三藏十二部，提出了「儒佛互攝說」，以為「六藝之言，顯

於此土。三藏之奧，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原無二。」後來他發起在家居士成立「般若會」，杭州各大叢林的方丈也都成了他的座上客。故此，此時的馬一浮，在眾人的心目中成了國學一宗、佛學大師了。同時，馬一浮與梁漱溟、熊十力被學界稱為中國新儒學的「三駕馬車」。

抗戰爆發後，馬一浮避難內地。曾在戰時的浙江大學任過「特約講座」，也在四川辦了復性書院。日本投降後，馬一浮回到杭州。一九四九年後，曾任浙江文史館館長。一九六七年（大陸「文革」期間六月二日在杭州逝世，終年八十四歲。

## 二

無論是在出家人眼裏，還是在在家居士的心目中，馬一浮都是一位品學高尚的佛學大師。他與出家人的關係十分密切，杭州的高僧大德幾乎都成了他的朋友。蘇曼殊曾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覆劉本農的信中談到：「此間有馬處士一浮，其人無書不讀，<sup>不慧</sup>曾兩次相見，談論娓娓，令人忘機也。」其實，就馬一浮的佛緣而論，或許是他與弘一大師的因緣最為讓人銘記了。

弘一大師早在出家前的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三年間就與馬一浮相識。當時弘一大師（李叔同）正在上海南洋公學就讀，受業於蔡元培，而馬一浮此時亦在上海遊學。到了民國初年，弘一大師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時，他與馬一浮的交往就多起來了。

弘一大師在實行斷食修煉後，對佛教的興趣日增，他自然想到了馬一浮這位深居簡出的佛學大師馬一浮。弘一大師對馬一浮極為推崇。他對學生豐子愷說過：「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個人，生出來就讀書；而且每天讀兩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書之厚薄），而且讀了就會背誦，讀到馬先生的年紀，所讀的還不及馬先生之多。」有關弘一大師與馬一浮談論佛教的情況，豐子愷在《陋巷》一文中有形象的記述：

第一次我到這陋巷裏，是將近二十年的事。那時我只十七八歲，正在杭州的師範學校裏讀書。我的藝術科教師L先生（L即指李叔同——引者）似乎嫌藝術的力道薄弱，過不來他精神生活的癮，把圖畫、音樂的書籍用具送給我們，自己到山裏去斷了十七天的食，回來又研究佛法，預備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日，他帶我到這陋巷裏去訪問M先生（M即指馬一浮——引者注）。我跟著L先生走進這陋巷中的一間老屋，就身看見一位身材矮胖而滿面鬚髯的中年男子從裏面走出來應接我們。我被介紹，向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隻椅子上聽他們的談話。我其實全然聽不懂他們的話，只是斷片的聽到什麼「楞嚴」、「圓覺」等名詞，又有一個英語「Philosophy」（即哲學——引者注）出現在他們的談話中。

豐子愷是一位文章高手，他對馬一浮的描述十分傳神：

他的頭圓而大，腦部特別豐隆，假如身體不是這樣矮胖，一定負載不起。他的眼不像 L 先生的眼地纖細，圓大而炯炯發光，上眼簾彎成一條堅致有力的弧線，切著下面的深黑的瞳子。他的鬚髯從左耳根緣著臉孔一直掛到右耳根，顏色與眼瞳一樣黑。

弘一大師在馬一浮那裏請回不少經書閱讀，並於一九一七年下半年起發心食素，又在自己的房間內供起了佛像。一九一八年正月十五日，弘一拜了悟法師行了皈依禮，並於該年夏天正式出家。兩個月後，弘一要到靈隱寺受戒。馬一浮知道後，親自到靈隱寺去看望，又以《靈峰毗尼事義集要》、《寶華傳戒正範》相贈。弘一大師後來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的自序裏寫道：「余於戊午七月出家落髮，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馬一浮居士貽以《靈峰毗尼事義集要》並《寶華傳戒正範》，披玩周環，悲欣交集，因發學戒之願焉。」可知，從客觀上講，馬一浮為弘一大師學佛研律起到了「指路人」的作用。

對於這樣一位「指路人」，弘一大師是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學習的機會的。這從他以及他的道友的一些書信文章中都能透露出若干消息。比如，范古農居士在〈述懷〉一文中寫道：「一九一八年，師出家後，九、十月間來嘉興佛學會，居會兩月，杭州海潮寺請弘一禪師主七，馬一浮先生招之往，遂行。」弘一大師在回到杭州後，也曾在給舊友許幻園的信中提到：「在禾晤談為慰。馬一浮大師於是間講《起信論》，演音亦侍末席，暫不他適。」目前留下來的馬一浮致弘一大師的信件有五通，大多是談論佛教的。在一九三九年弘一大師六十初度之時，馬一浮有一首六言詩致賀：

世壽迅如朝露，臘高不設春秋。

寶掌千年猶駐，趙州百歲能留。

偏界何曾相隔，時寒珍重調柔。

深入慈心三昧，紅蓮化盡戈矛。

弘一大師圓寂後，馬一浮也寫了二首五律輓詩：

高行頭陀重，遺風藝苑思。  
自知心是佛，常以戒為師。  
三界猶星翳，全身總律儀。  
祇今無縫塔，可有不萌枝。

春到花枝滿，天中月相圓。  
一靈元不異，千聖更何傳。  
交談心如水，身空火是蓮。  
要知末後句，應悟未生前。

一九五四年初，杭州弘一大師舍利塔落成，馬一浮為塔身題寫了「弘一大師之塔」六個篆字。紀念塔落成典禮時，馬一浮亦親自參加，並有〈虎跑禮塔〉詩一首：

扶律談常盡一生，涅槃無相更無名。  
昔年親見披衣地，今日空餘繞塔行。  
石上流泉皆法乳，岩前兩滴是希聲。  
老夫共飽伊蒲饌，多愧人天獻食情。

### 三

儒、佛、道三教圓融是馬一浮理學思想的一個特色。之所以說其是一個特色，是因為他跟以往的理學不同，並不排斥佛老，公開主張三教圓融。

馬一浮認為歷史上的漢宋之爭：「為漢學者詆宋儒為空疏，為宋學者亦鄙漢儒為錮蔽，此皆門戶之見，與經術無關。」不過他以為，類似此類紛爭，無非是儒學內部的門戶之爭罷了，它與三教的創始人孔子、釋迦、老子本無關係。他說：「推之儒佛之爭、佛老之爭，儒

者排二氏爲異端，佛氏亦判儒家爲天人，乘老莊爲自然外道，老佛互詆，則如顧歡〈夷夏論〉、甄鸞《笑道論》之類，乃至佛氏亦有大小乘異執，宗教分途，道家亦有南北異派，其實，與佛、老之道皆無涉也。」馬一浮的這種認識是在他對三教的充分研究基礎上才得出的。先賢創立學說時本來相通於一理，胸懷博大，體認精緻，此後出現互相排斥現象，均是某些後學「執一而廢他」，「局而不通」或門戶之見所致。他告誡、提醒人們，不要被學說的名稱所障，要瞭解學說本身的教理，所以他說：「統是總相，類是別相，總會不離別，別不離總，舉總以該別，由別以見總，知總別之不異者，乃可與言條理矣。」「大凡學術有個根源，得其根源，才可以得其條理；得其條理，才可以得其統類。然後，原始見終，舉本該末，以一禦萬，觀其會通，明其宗極，昭然不惑，秩然不亂，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云無乎不備，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大學》所謂『知本知至』，便是這個道理。」

由此可見，馬一浮的這些見解都是他深研諸種學問的本源之後而得出的，只有這樣，才能做到「不局、不雜，知類也；不煩、不固，知要也。類者辨其流別，博之事也；要者綜其指歸，約之事也。」

關於佛與道的關係，馬一浮有過精到的見解。他在《老子注》中說：「以老子義印合般若、方等，於禪則與洞山爲近。觸言玄會，亦似通塗寥廓，無有塞礙。」他以爲老子「無」的境界與般若學說的「無自性」相通，「諸法實相，緣生無性；以緣生，故可道；無性，故非常道。一切言教，假名無實：以假名，故可名；無實，故非常名。真常委之體，不可名邈，可者，許其暫立，實無可立。非常見者，責其終遣，亦無可遣。」究其實，馬一浮是把老子的「無」與佛之「空」溝通了起來，老子的「自然」與佛的「法界」原本是能融通的。所以他又言：「道法自然」，就是華嚴宗的「法性平等，無取無證，無得無失。」「從事於道者，則與自然相應。一切同於自然，而非斷也。生滅、一異、去來，準此可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悟則爲佛，迷成眾生；在佛爲道，在心爲德，在眾生爲失，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馬一浮當然沒有忘記闡述儒與佛的關係。他的觀點是：「原夫聖教所興，同依性具，但以化議異應，聲句殊施，故六藝之言顯於此土，三藏之奧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無二，推其宗極，豈不冥符，果情執已，則儒佛俱泯。」與老子的「無」跟佛之「空」溝通相伴的馬一浮，把儒家的理事雙融之說與佛教華嚴宗的「四法界」也溝通了：「佛氏華嚴宗有四法界之說，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無礙法界，四、事事無礙法界。孔門六藝之學實具此四法界，雖欲異之而不可得，先儒只是不說耳。」

一九一八年，馬一浮有一篇〈與蔣再唐論儒佛義〉，此後被人們認爲是一篇闡述儒佛關係的代表之作。以上諸引文，有一些就出自此篇大作。除此之外，還有以下一些精彩的觀點：

察乎此者，交參互入，並行不礙。前賢以異端屏釋，古德以外學判儒。遂若體物有遺，廣大不備。其猶考之未盡密耳。嘗以西來眾典，義啟多門；鄒魯所承，道唯一貫。彼則一乘是實，此乃易道至神。今欲觀其會通，要在求其統類。若定以儒攝佛，亦聽以佛攝儒。須以本跡二門辨其同異。蓋跡異故緣起有殊，本同故歸致是一。就跡則不奪二宗，依本則不害一味。若跡同者，二俱不成，若本異者，一亦不立。今雙立儒佛，正以同本異跡。故存跡以明非，即就本以明非。離則不失於二，不違於一。是以儒佛得並成也。

又說：

《易》以天地之道冒人道，猶以一法界收一切法。圓教之准（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眾生心中悉有如來智慧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所謂從初發心便成正覺也。

馬一浮是理學大師，但人們常說他的理學充溢著濃濃的佛教色彩。以上諸言，當是再好不過的例證了。難怪有人這樣評說：「如果說，宋明儒者通過融合佛學將儒學變成理學，馬一浮則是通過融合佛學，使理學進一步佛學化。」